



贫困和 贫困统计数据的背离

加纳的取水儿童。

Ravi Kanbur

为什么官方统计表明贫困下降，而去救济站的人却更加多了？

长久以来，经济学家一直在试图改进GDP作为经济和福利衡量指标的可靠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在寻找一种能够综合测量经济、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的新标准。

然而对于那些处在收入金字塔的底部，每天只能靠一美元甚至更少的钱来维持生计的穷人来说，这些经济学家的冥思苦想看起来是牵强附会和无关紧要的。许多年来，经济学家都在致力于摆脱在衡量经济绩效时对人均收入增长和人均消费数据的过分依赖，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测算国际委员会的成果使这项工作达到了新的高度。该委员会是法国政府创办，由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阿马蒂亚·森领导的。

分配性指标，如由家庭收入和支出调查所得到的贫困统计，逐渐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穷人的困境上。在印度等某些国家，官方贫困数据的公布是有着重大政治和政策意义的大事。在过去的20年里，为了记载贫困的状况，许多国

家已经开始进行家庭调查，因此全球有关贫困的统计越来越普遍。

从最新的贫困统计数据中我们能够了解到什么？抛开最近的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不提，回顾2005年之前的20年，各个国家的情况可以分成如下两种程式化的模式（Kanbur，即将出版）。第一种情况是经济没有增长，贫困也在加剧，许多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都是这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在众多国家中都存在，包括人口最多的中国和印度，甚至像加纳这样的非洲国家都是如此，从历史标准来看，这些国家的经济有了快速发展，贫困线以下人口所占百分比有所下降，正如官方数据所显示的那样。

然而有趣的是，官方贫困数据所描绘的乐观图景和基层民众、民间团体和决策者所持有的悲观态度之间有着巨大的背离。这种背离显然不是用官方贫困数据这种方式所能量化的。实际上，背离的证据是更加间接和定性的。例如，加纳等地的“参与式贫困评估”、中国

政府对社会动荡的忧虑，以及2004年印度大选的结果（执政党连续10年公布贫困率下降的官方数据却被反对党击败，前者“闪耀印度”的口号输给了后者“平民至上”的口号）。实际上，整天看起来坐立不安的决策者一到了分配问题上就积极表现，即使是在治理贫困工作做得非常好的国家也存在这种现象。

到底发生了什么？难道是官方的贫困数据在误导我们吗？为什么当官方数据显示贫困现象在好转的时候，实际上的贫困却在不断加剧？证明贫困在好转的量化证据看起来很有说服力，而人们广泛关注的却是贫困的状况没有怎么改变，这其中的背离可以用五个原因来解释。

数字游戏

让我们考虑当一个经济体内部的贫困率正在以每年1%的速率在下降的情况。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据，对于一个非洲国家来说更是如此。按照这种速率发展下去，这个经济体不久就将达到它的第一个千年发展目标——削减收入贫困的发生率。

但是假设这个经济体的人口正在以每年2%的速度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口的比率每年以1%的速度下降，但是穷人的绝对数量每年却在以1%的速度增长。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虽然官方公布的“头条数据”显示贫困状况在好转，但食品接济站却越来越拥挤，越来越多的孩子流浪街头、无家可归，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为自己的生计焦虑。

在贫困率下降相对较慢、人口增长相对较快的经济体（比如许多非洲国家），这种官方数据和实际情况的背离最为严重。然而这种背离的趋势存在于所有的经济体当中，甚至中国也不例外。近年来，中国的贫困发生率和穷人的绝对数量都有了显著的下降，但贫困发生率的下降仍然比穷人数量下降的速度要快（Chakravarty、Kanbur和Mukherjee，2006）。

获取公共服务的价值

家庭调查在获取商品和服务买卖的市场价值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在印度和加纳等国，来自调查对象的消费数据是确定贫困数据的关键。近几年来，这些调查在获取非市场活动（如为自家消费而进行的生产）的价值方面也做得越来越好。

然而家庭调查却并不擅长于获得诸如卫生、教育和交通等公共服务的价值。理论上讲，把这些价值整合到福利的标准货币测度中并没有特别的难度，但是从经验上看，估计每个家庭所获得的公共服务的价值是有很大难度的。

无论如何，这都不是各国编纂官方统计的方法。

当然，这些调查确实会搜集卫生保健、教育、水、卫生设施和其他公共设施的普及度和质量的信息，但是调查中并没有把公共服务的价值整合到社会福利的收入支出测度中，而贫困率正是从社会福利的收入支出测度中计算出来的。

然后我们再考虑一下，一个经济体正在从依靠公共服务向依靠私人部门转变。许多人会说，正是这种

“这部分人口（可能还不是一个小数目）因为贫困加剧而造成的痛苦不会改变国家层面贫困水平的下降。”

转型带来了经济增长。家庭调查将会得到私营部门交易增长的数据，但是往往相应的公共服务的下降却被忽略了。这就是问题所在，因为不管公共服务的效率多么低下，但至少这些服务对穷人来说是具有部分价值的。

正因为公共服务的价值没有被纳入到标准家庭调查福利尺度中，标准的官方贫困统计才夸大了全社会的福利，包括那些处于收入分配层次最底部的人的福利都被高估。因此正是由于越来越多的社会活动向私营部门转移，导致官方统计夸大了贫困的下降。

考虑家庭内部的不均等

标准家庭收入支出调查的另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所有的货币测度信息都是从家庭层面搜集的。为了将这种信息转化成反映个人福利的量度，通常的做法是按照家庭的大小把人均收入或消费额分配给家庭内部的每个人。但是我们知道家庭内部存在极大的不平等，妇女和小孩在家庭消费中所占的份额显然要比男性小得多。

因此，家庭内部的不平等信息被抑制了。菲律宾的一个特别设计的营养调查分析显示，如果忽略家庭内部的不平等，将低估30%的实际不平等和贫困状况（Haddad和Kanbur，1990）。

这些发现都表明，官方统计反映出的贫困率确实比实际收入分配所显示的要低。但是我们没有数据去计算出具体差别，因此只能说官方宣扬贫困情况在好转的乐观态度和现实之间是有所背离的。

穷人中也有赢家和输家

考虑一个国家正在进行一些重大的结构性变化，不管是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这些变化都注定会造就一些赢家和输家。如果全部的穷人都成了赢家，或者部分穷人成了赢家而没有穷人成为输家，贫困

的情况显然会好转；但是即使输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穷人，测量出来的结果依然有可能显示贫困情况在好转。这是因为这些穷人的损失被成为赢家的穷人所获得的好处给掩盖了。这部分人口（可能还不是一个小数目）因为贫困加剧而造成的痛苦不会改变国家层面贫困水平的下降。这将导致那些关注官方统计的人的看法不同于那些关注穷人中输家的人的看法。

因为国家层面的贫困数据是从快照式的调查中计算得出的，我们不能直接测试它的逻辑性。有效的固定样本数据确实显示相当一部分人口的福利水平出现显著下降，这多少印证了该假设，但是相关的文献却没有使用这些数据来鉴定自由化或全球一体化所带来的影响。

然而，在那些支撑国家贫困数据的周期性调查中，我们发现日益严重的不平等性也支持这种逻辑。当然，即使在一国内部的不同地区之间，减贫率也会相去甚远。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加纳整体的贫困率是下降的，然而在某些测度中，该国北部地区的贫困率却保持不变甚至有所增长；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墨西哥整体的贫困水平在下降，但在其贫穷的南部地区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Kanbur和Venables, 2007）。在其他强调贫困深度的国家，贫困调查所显示的贫困下降就没有那么多，这表明在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下和接近贫困线的人口遭遇的问题更严重（McKay和Aryeetey, 2007）。

死亡和贫困的关系

所有的官方贫困指数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如果保持其他变量恒定，穷人的死亡是能够降低贫困的。也就是说一旦一个穷人死亡，那么测量出的贫困率就会下降！

这样的计算似乎不太符合我们的道德标准，但这确实是贫困指数不能逃避的一个特征，而且穷困人口

的高死亡率意味着这是贫困数据的普遍问题。

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在避开这个道德问题的同时保持统计的完整性呢？一种方案是把死亡率，或预期寿命，明确地引入到统计当中（Kanbur和Mukherjee, 2007）。一旦我们这样做了，就能避免这样的情况：HIV/AIDS提高了农村穷人的死亡率，从而导致观测到的贫困率出现下降。另一种更加乐观的情况是，降低穷人中的婴儿死亡率将会使测度到的贫困率上升。这

“这将导致那些关注官方统计的人的看法不同于那些关注穷人中输家的人的看法。”

里，为了抵消统计结果的负面影响，社会评估必须从所有的维度来考虑社会福利，包括把预期寿命纳入其中。

更好的方法，更好的结果

基于上述所有的原因，穷人有可能从一个新方案中得到实质性的好处。2009年10月，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国际委员会拟定的新方案正是这些方案中的一个。该方案建议更加广泛地使用家庭调查，以获取一系列更加充分的数据，从而精确地描绘出穷人的生活状况，这将有助于当局设计新的政策，以帮助人们脱离贫困。

尽管如此，这样的努力还是远远不够的。简单地依靠人均收入作出的贫困统计仍然可能描绘出过于乐观的前景，这是因为委员会报告中强调的许多其他因素都被忽略掉了，它们包括：非市场服务、家庭内部的性别不平等，以及福利的非收入维度。要做出真实反映贫困现状的贫困统计，还有很多的工作等待我们去做。■

Ravi Kanbur是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

参考文献：

Chakravarty, Satya, Ravi Kanbur, and Diganta Mukherjee, 2006, "Population Growth and Poverty Measurement," *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 Vol. 26, No. 3, pp. 471-83.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 2009, report; see www.stiglitz-sen-fitoussi.fr/documents/rapport_anglais.pdf.

Haddad, Lawrence, and Ravi Kanbur, 1990, "How Serious Is the Neglect of Intra-Household Inequality?" *Economic Journal*, Vol. 100 (September), pp. 866-81.

Kanbur, Ravi, forthcoming, "Globalization,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Framing the Questions," in *Equity and Growth in a Globalizing World*, ed. by Ravi Kanbur and A. Michael Spence (Washington: World Bank for

the 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 and Diganta Mukherjee, 2007, "Premature Mortality and Poverty Measurement," *Bulletin of Economic Research*, Vol. 59, No. 4, pp. 339-59.

Kanbur, Ravi, and Anthony J. Venables, 2007, "Spatial Dispariti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Global Inequality*, ed. by D. Held and A. Kay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p. 204-15.

McKay, Andrew, and Ernest Aryeetey, 2007, "Growth with Poverty Reduction, but Increased Spatial Inequality: Ghana over the 1990s, in *Determinants of Pro-Poor Growth: Analytical Issues and Findings from Country Cases*, ed. by Stephen Klasen, Michael Grimm, and Andy McKa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